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陈其泰

摘要 新历史考证学在 20 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著成就,于整个 20 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 1949 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 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新历史考证学 实证考察 贯通研究 唯物史观 新中国史学道路

新历史考证学是 20 世纪影响至巨的史学流派,而对它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路径,新历史考证学者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性治学经验是什么,在今天对我们又有何宝贵的启示,迄今均未得到清晰的解答。这些问题的探索不唯对于总结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关系重大,而且对于推进当代史学的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此略申己见。

一、新历史考证学派兴起的学术文化条件

考证之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至清朝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名家辈出,著述丰富,在史料考订和文献整理上均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并且探究、总结出一套严密精良的考史方法,因而成为 20 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乾嘉时期学者由考经而考史,在诸如文字训诂、音韵、天文历算、舆地、典章制度、经籍注疏、史实考订,以至校勘、辑佚、辨伪、目

录等领域,长期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主要辑刊乾嘉考证学论著的《皇清经解》正续编,合计有一百七十余家,近四百种二千八百余卷,可以说是对朴学成就的一次检阅。新历史考证学者尤为服膺乾嘉名家治史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发展。对此,郭沫若在评价王国维的贡献时即讲过很中肯的话,称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成为“新史学的开山”^①。

20 世纪的历史考证学者还十分幸运地得到时代丰厚的赐予。恰是在 20 世纪即将破晓的时刻,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史料被发现,这意味着为古史考证打开了新的法门。此后,不仅甲骨文卜辞大量出土,

^①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历史人物》,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37 页。

而且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内库档案也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发现。20世纪初著名的“四大新史料”的发现,以及一批少数民族史料(包括梵文、回鹘文、西夏文等)的相继发现,在中国上古史、中世纪史、明清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向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课题。故郭沫若评论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①陈寅恪也曾将敦煌写本的发现引起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称为学术的“新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②

时代思潮和学术观念的更新也是促成新历史考证学兴起的重要条件。从国内方面说,是由于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名文《新史学》,倡导实行“史学革命”、开启学术的新时代,呼吁史家摆脱旧时代长期形成的因袭和附会的积弊,代之以明确地将社会各方面情状和阶层活动都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写出真正能反映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之新史。次年,他著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论文,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摆脱以往只能作经解式或札记式文字的圭臬,逐渐转变为有体系、有层次、作连贯性论述的研究新范式。在这篇名文中,梁启超将中国几千年学术区分为春秋以前的“胚胎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时期的“全盛时代”、两汉时期的“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阶段,精辟地评价了各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及其著作,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了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以及这些特点又是由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而产生的,前一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成为这一时代的渊源,这一时代的思想又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从而使几千年学术发展趋势和诸多重要思想家的学术风貌,顿现在读者面前。全文脉络连贯,气势非凡,精彩的论述随处可见。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站到了新的时代高度,具有近代哲学的眼光和进行系统分析的头脑。梁启超其他的多部名作均具有这样的特点,即摆脱了札记式的对个别事项的考证,祛除盲从附会,扩大视野,注重将史实联系起来考察,进而探求历史的演进趋势和因果联系,这种治史新范式

无疑对新历史考证学者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使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受了一场洗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势如狂飙巨浪,彻底冲破长期以来封建主义愚弄民众、禁锢思想的堤坝。以往的历史学长期作为经学的附庸,经书中的记载就是绝对真理,只能盲目尊崇。直到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受到彻底批判,经书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被推倒,史学才彻底地摆脱了经学的羁绊,取得完全独立。经书已不再是被崇拜的对象,而成为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经书被置于一般历史记载和史料的地位,同样要受到审查和批评。这对于历史考证领域贯彻求实求真的原则,冲破禁区,提出有关上古历史以及历代典籍的一系列的考证新课题,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高举“科学”的大旗,有力地推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概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与迷信、盲从相对立的思想方法来宣传和实践的。具体到历史学科而言,便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以科学方法、实证方法为武器,廓清杜撰与附会。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原有的学问,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正如陈独秀所言:“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呈现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③梁启超对科学的解释则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的方法”。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个字,作为“五四”时期建设新学术的纲领。其“整理国故”所指内容,大部分都应包括在新历史考证学的范围之内,因而其相关论述确实为有志于此道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学术观念更新的条件,从国外方面说,是西方新学理的输入。西方学术的传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较大声势,至“五四”前后呈现强劲的势头。不但有英、法、德、美等国学者的历史学、社会学论著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的批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③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期。

翻译出版,《新青年》、《史地丛刊》、《东方杂志》等期刊常年登载介绍西方学理的论著,一些大学历史系还开设了西洋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原理等课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此一时期的输入“已经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①。19世纪至20世纪初年,在西方史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注重实证和强调“审查史料”的德国兰克学派,传入中国并对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也正是这一史学流派,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治史方法与“五四”时期支配学术界的科学主义思潮相呼应,尤其与当时因特殊的学术与社会条件而兴起的新考证史学要求严密考证的治史特征相吻合。兰克治史长达70年,前后跨度极大,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复杂,评论者对其史学思想、学术风格确有不尽相同的评价。然则,兰克及其学派对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主要影响又是明确的,即高度重视第一手资料,用审查、批判的眼光对待史料,强调“据实直书”,倡导一种尊重史实、客观叙述的治史态度,并将此视为达到史学“科学化”的途径。兰克创立“历史考证学”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及强调严格地审查史料,弄清提供史料者的身份、性格、环境等,然后确定其价值的方法,与中国乾嘉史家所遵循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溯源”的治史方法,从精神到方法的运用都是相通的。兰克倡导的审查和考辨史料的方法给人提供了大量富有深刻意义的启示,而且他提出的当事人的信件和原始档案比历史记载更可靠,应该考核提供史料者的性格、经历等项命题,较之中国乾嘉考史学者的主张更具近代科学的价值。正因如此,傅斯年、陈寅恪等原本即熟悉乾嘉考史方法的学者,赴德留学后,对于兰克学派这门“考证的科学”自然迅速接受并且心悦诚服。除了兰克学派的影响之外,西方新学理的传播还应包括进化论、欧洲学者较为重视的“民族—文化—史”的观点和方法,以及美国杜威“实验主义”的逻辑方法等。

总之,由于上述四项条件——对乾嘉学者考证传统、考证方法的继承;“四大新史料”的发现;“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西方新学理的传播——多重因素交互作用,有力地催生和促进了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本来就是历史学的沃土,治史历来备受重视,在这一领域耕耘的

学者人数甚众,适逢20世纪前半期的因缘际会,滋生、壮大了新历史考证学这门学问,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相继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干流之一,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史学”流派交相辉映,齐流竞进。新历史考证学派与乾嘉考证学有渊源的关系,但又具有崭新的时代内涵,在史料的利用、治史观念、考史方法等方面,更加科学严密,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新历史考证学”以科学的界定。

二、新历史考证学派治史的基本特征

新历史考证学形成阶段为1920年前后,其拓展阶段为30年代至40年代。新历史考证学在学术视野、史料占有范围、审查资料的观念和逻辑方法运用、探求历史的深层认识、推进历史研究的“科学化”等多个方面,都较传统考证学者达到更高层次,当然也更具科学的价值。如果用最集中的表述来对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治学风格作出概括,即“实证考察”和“贯通认识”。“实证考察”主要概括其严密考证和重视扩充史料的特点,“贯通认识”则主要概括其历史见识和重视理论指导的特点。在许多成功学者那里,大都做到了二者的密切结合。

我们可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例,他们都是新历史考证学中最为出色的学者,虽然三人治史范围各有不同,学术旨趣和方法也各有特色,但他们都做到了“实证考察”与“贯通认识”二者相结合。这些成就卓著的学者不仅熟悉史料,功力深厚,善于考证,而且他们处于20世纪前期中西学术交流的关口,在历史观点、学术视野上达到了新的境界,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正是新历史考证学取得世纪性成就的经验精髓之所在。

王国维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以新发现的甲骨文考古资料与传统的典籍文献互相释证,在殷商史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独具慧眼运用新史料,让新出土的甲骨文为古史研究服务;再就文献而论,他突破以往学者只从史书找证据的局限,对先前视为神话、小说而不当作历史资料看待的记载

^① 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如《楚辞》、《山海经》等),也加以重视。作于1917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是王国维的名作。他把与卜辞相质证的文献范围,由《史记》扩大到《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汉书·古今人表》、《吕览》,甚至扩大到金文,广参互证,从而使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他手里迎刃而解。例如王亥,他首先注意到卜辞中多记王亥事,“乃祭礼中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但据《史记·殷本纪》载,商先祖中无王亥,只记载“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王国维以文献参证,指出这个“振”,在《世本》中作“核”,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作“垓”。据此,他判定“《史记》之振当为核或垓字之讹也”,并且广引其他典籍,证明《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之“王亥”,《古本竹书纪年》中之“殷王子亥”,《今本竹书纪年》中之“殷侯子亥”同是一人,“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①。至此,王国维又从甲骨文中考证出一位商先公名号,并且以详审的证据纠正了《史记》中的一项误记。用同样的方法,王国维考证出卜辞中的王恒也是商先公,又根据卜辞中报乙、报丙、报丁,字皆在口中,考证出卜辞中的田就是上甲微,并且第一次采用甲骨缀合之法,考证出上甲微以下的世系应该按“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顺序排列,改正了《殷本纪》作“报丁、报丙、报乙”的误记,并预言示癸与大丁之间应缺大乙,也为以后学者所证实^②。这就证明,正由于成功地做到“实证考察”与“贯通认识”相结合,才得以使甲骨文研究由限于文字考释、个别人名地名释读,提升到探讨上古史重大问题的崭新阶段。他向学界证明,运用“二重证据法”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方法,使文献所载几千年前商先公先王世系获得了地下出土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史名著史料价值的可靠性总体上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故陈梦家称誉说:“商殷世系的条理,《殷本纪》世系的证明,有赖于王国维的系统的研究。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利用这批新资料作为历史制度的系统研究的,则始于王氏。”^③齐思和也指出,王国维的重大功绩是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古史上,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④。王国维运用“实证考

察与贯通认识相结合”而取得的出色成果,为治史打开了新的法门,因而成为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标志。

陈寅恪先生所长期致力研究范围是“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他采用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民族—文化”观念、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外来观念和方法,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严密考证的方法结合起来,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因小见大,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能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探求历史演进中带全局意义的大事。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瞭,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⑤。陈寅恪在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同样先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再作综合分析,揭示出对历史演进有重大意义的内在关联。如他分析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的延续,实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渊源之一:“秦凉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⑥,确实显示出超越前人的见识。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⑦。

陈垣先生的考证学成就则主要体现为将传统文

- ①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观堂集》(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9页。
- ② 以后,董作宾又以缀合的第三片甲骨证实王国维此说,参见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 ③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34页。
- ④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载《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4页。
- 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 ⑥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1页。
- ⑦ 胡如雷:《读〈汪钱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读书》1982年第2期。

献学推向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出色努力。陈垣早年学习西医,系统学习过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而在科学方法上受过良好的训练,故他虽然未曾留学外国,却能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考证学领域,成为新考证学的学术大师。陈垣在文献学上的成就,包括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诸项。利用严密考证方法在整理文献上取得很大成就,这是清代朴学的特色。而陈垣又能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其原因即在于他不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成就,而且善于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因而他的文献研究具有近代的特点。他所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是成功的例证。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校勘四法”:对校法,以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理校法,不凭版本而据逻辑道理定是非。陈垣在许多著作中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元典章校补释例》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他的另一著作《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属于校勘性质的专书,全书五卷,收录材料一百九十四条,为例一十。“类例法”也有举一反三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将这些校勘学的原则运用到其他时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避讳,是指我国辛亥革命以前特有的一种制度和习惯,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中国历史久远,朝代更换又多,各朝所避的讳不同,避讳方法又不一致;文献上常因避讳而改换文字,甚至改变前人的姓名、官名、书名,前代的地名、年号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乱致疑。反过来,如果懂得避讳知识及其规律,则可以解释古书的疑滞,辨别古文书的真伪及时代。清代考证学名家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中特意多立避讳之条目,解释古书疑难。陈垣很重视这些成果,他所著《史讳举例》一书,即意在继承钱大昕的学术,而“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全书八卷,归纳了八十二例。前四十二例,主要讲避讳所用的方法、避讳的种类、避讳改的史实、因避讳而生之讹异;后四十例,主要涉及避讳学应注意的事项、不讲避讳学之贻误、避讳学之利用、历朝讳例。引书达百种以上,故此书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有用之工具。总之,陈垣在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等方面为推进传统文献学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当代学者作出了公允的

130 天津社会科学 2014年第5期

评价:“关于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经验,但就以上四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是从陈垣先生开始的”^①。

这里,还应特别论及傅斯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章中,一再强调“让史料说话”,“史学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反对疏通”,“存而不补”,因而长期以来,傅斯年在学术界的形象便是大声高呼“史学即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重视扩充史料、考证史料。实际上,只要探究其所撰《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著作,便可明白:傅斯年在史学研究实践上又是最重视因果关系的疏通、证明,他以西方学者“民族—文化”观念指导研究,敢于作极大的推论。他所尤为关注之点,是政治集团或族群间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论述其势力消长及盛衰变化,从而对商周之际的历史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一文,考证“小东”、“大东”及周初鲁、燕、齐始封国之地望,均联系周与殷商之间文化水平高低和政治势力强弱之互动关系立论。他认为,《诗·小雅·大东》所言“大东”,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小东”即今山东濮阳大名一带,亦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也。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周灭商以后,处置原有之殷民是极艰巨困难之工作。既然周初封康叔于卫,微子犹得保宋,则周公、吕公等人封地必距成周不远,才能起到辅翼周王室的作用,也才符合利用殷商旧地较高的人文、物质条件的道理。故他参稽多项证据,推断燕之初封地应与今河南鄆城有关,鲁周公之初封地应在今河南鲁山县,齐太公之初封地本在吕。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两千年来,历代读《诗》、《书》学者不知凡几,有谁敢作出这样大胆的推断呢?故此,重视史料实证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才是真实的傅斯年。

傅斯年所撰《〈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同样以“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若干关键问题的依据。其论云:“凡是一个野蛮民族,一经感觉到某种文化高明,他们奔赶的力量,远比原有这文化的人猛得多。这是一个公例。王季文王武

^①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王的强烈殷商化,并用一个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讨殷商或殷商治下诸侯的女儿做老婆。这是野蛮人整个接受文明人的文化系统的大道。后代的历史证明这个事实很清楚。譬如唐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弃宗弄赞一事……又如回纥,历世受唐婚,结果是唐化向西方流布。”^①《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在论述殷周之际殷民族与周民族之间政治、文化之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殷民族“为中国文化之正统”的独特观点:“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②。以上论述足以证明:唯其重视扩大史料和严密考证,加上运用新的观点,傅斯年才能写出一批重要著作,在史坛上产生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是:摆脱以往著作家只能作经解式或札记式文字的著述风格,转变为有体系、有层次的研究。新历史考证学家正是一方面发扬传统学者严密考证的方法,扩大史料范围,一方面自觉地运用进化观点、因果关系、“民族—文化之史”等观念和方法治史,出色地做到“实证考察”与“贯通认识”二者相结合,从而使其学术成果凸显出新的时代气息,为推进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科学历史观的指导把 新历史考证学推向新境界

新历史考证学形成于“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间稍晚一些,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的出版是其创始和形成的标志。1949 年以前,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平行发展,均为两大史学干流,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也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于 1929 年称赞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至 1945 年,他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

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③。侯外庐在其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果,明确表示“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的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④。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将其用以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顾颉刚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为基本观念。”^⑤吕思勉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时期经济的研究,原因即在于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并用以指导其史学研究。他在 1945 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马克思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很有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⑥。这里应当特别指出: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贯通。问题在于,新历史考证学家的运用是素朴的,尚未达到十分自觉的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构成体系的,而且要求自觉地运用,因而能够达到更高的层次,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新历史考证学在 20 世纪前半期成就斐然,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也催开了历史考证学领域新的绚丽之花,跃进到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年,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训练的学者,其时年纪正当 40 岁上下(有的略大一些),他们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他们对于建国

① 《傅斯年全集》(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年,第 253~254 页。

② 《傅斯年全集》(三),第 166~167 页。

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1 卷,第 8 页。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225 页。

⑤ 顾颉刚:《古史辨》第 4 册“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⑥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是真诚欢迎的,一方面,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如吕思勉已年过六旬,学习唯物史观却热情高涨,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思想总结,真诚地回顾自己早在47岁时就接触到唯物史观,“但愧未深求”,现在更认识到马列理论中有更丰富的内容,“当努力补修”^①。唐长孺在1955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真切的表达,他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②。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在研究工作中经过反复思考,终于认识到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决然放弃原先的看法。

蒙文通是这批考证学者中年龄较长者,他通过学习唯物史观理论,认识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并用以指导学术研究,治学风格大为改观,尤具典型意义。蒙文通长期钻研经史之学,于儒家学说钻研尤深,但在探求孔、孟、董、朱、王等儒家人物著作中积累了诸多未决的问题,至解放后学习了马列主义才找到答案。对此他深有感慨,他说:“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③他早先即怀疑朱子“格物致知”,阳明“满街尧舜”,认定其说均大有弊端,然如何解决,却又未能明晰。正因为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蒙文通才认识到朱子、阳明之说法虽不同,表现形式虽不同,但致误之根源却是相同的,即违背了先有事物、后有规律,思想意识要靠教育和实践去提高的根本原理。故蒙文通总结朱子、王阳明的失误在于“先天论”,而正确的观点则应是马列主义所阐明的“发展论”。

蒙文通在解放初学习马列主义而使数十年积惑一朝冰释,并用“先天论”和“发展论”来分析古人学说中的糟粕与精华的经历,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证明解放初年许多研究者学习马列主义,收获巨大,学术上升到崭新的境界,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

的结论;同时更有力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确是比传统思想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能给人以科学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是具有明效大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可以蒙文通的代表作《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及《越史丛考》作分析,证明他在建国后发表的论著,无论是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还是治学的风格,比起他以前擅长考证和朴素地运用分析方法来说,都已明显地有了质的飞跃。前者突出地反映出他不再满足于史料的详实和考辨的精审,而是上升到对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性作宏观的概括;后者则突出地反映了他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觉性和崇高责任感。

《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的论述主旨是,我国历史上“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扩大和增加,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的反映”,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通过对大量史实的综合分析、考察,蒙文通提出:“我国二千年来单位面积和农产量的扩大,前后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两汉,第二阶段是魏晋、六朝,第三阶段是唐宋,第四阶段是明清。”此文最值得关注之点是注重贯通性研究,强调唐之前与唐之后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唐代有着较大的发展。作为农业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作为封建基础的土地制度也都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隋末唐初为分界,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豪族世家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在此以后,农民和豪族世家的人格依附关系便逐渐为佃农和地主的经济契约关系所代替了。……农民地位的这一变化使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有了扩大,这样也就刺激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又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农民地位的这一变化,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反映在土地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方面的显著变化是:“自两汉、魏晋下迄于唐,都有打击豪

① 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页。

③ 蒙文通:《致张表方书》(1952年),《中国哲学》第5辑。张表方即张澜。

强兼并的限田制度和制民之产的均田制度。但从中唐以后,均田之制也只是被人作为议论题材罢了”,而“豪族世家丧失了其对农民的特权地位”。蒙文通进而认为,由于阶级关系等项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唐以后封建社会各项有关制度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诸如赋税制度由租庸调改为两税法,兵制由府兵变为募兵,人才选由贡举和九品中正变为科举考试,中央管制也由两汉魏晋的三公九卿制度变为隋唐的六部制度,标志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发生了摆脱约束、寻求自由思想的深刻变化,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也由宫廷转向民间,绘画题材“由朝市转向山林”等^①。

由建国前精熟典籍和擅长考证,到着力分析社会演进各部门、各领域的联系、发展的阶段特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由原先对具体问题的细致辨析,到对历史发展趋势作出宏观概括和见解精辟的阐释,我们不能不叹服蒙文通变化之大和进展之速。正是唯物史观理论这一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使蒙文通的学术不断升华。他以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动作为出发点考察社会演变的根本不同,提出唐以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地主身份性的变化,以及唐宋以后税制、兵制、选举、官制、意识形态诸多领域的相应变化等项,都是确有见地、自成系统的,显示出单纯从事考证的学者所难以具有的开阔视野和洞察力。“唐宋变革论”、“唐宋社会转型论”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而蒙文通早在 50 年代初即已提出“秦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巨大变化来看,可以唐前唐后分为两大段”^②的观点,并且从社会经济到阶级关系,再到意识形态领域,作了比较全面而又提纲挈领的论证。对此,胡昭曦先生早有论及:“‘断断续续写了几年’,于 1957 年发表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是集中体现蒙先生关于治史要通和探源明变学术主张的代表作,也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的社会变革和宋代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代表作。”“蒙先生明确提出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变革及其重要阶段,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地探讨了这些变革发展的原因、轨迹、特点等,为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是我国现代史学家中,较早注意到唐宋之际社会全面变革的学者之一。”^③而蒙文通先生的前瞻性见解恰恰是在 50 年代初刚刚接受了唯物史观指

导即提出来,科学的历史观在这位坚持“实事求是”和作辩证分析研究的学者身上,产生了明效大验。

《越史丛考》既是蒙文通早年从事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继续,又是他运用自己的丰富学识,为解决一个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而深入探求的成功之作。“越族”泛指古代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然因书缺有间,记载简略,事或若明若昧,越人分布地域即争论聚讼问题之一。蒙文通洞察到,以往中外学人论及古代越族分布的著作中一些缺乏根据甚至是纯属臆造、颠倒史实的言论,被国外学者别有用心地收集综合、穿凿解释,并借此推波助澜。他说:“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不过就楚越同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尚未有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尽越人所居者也,更未有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至越南者也。陶氏(越南历史学者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综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史者,莫不祖述其说,甚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实多影响之谈、附会之说,核之史实,舛缪自见。”^④蒙文通在书中考论了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以“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辨”列为第一项,进行有理有据的有力辩驳。

蒙文通详引各种古代文献进行分析、考辨,论述古代居于南方的楚族与越族的畛域。百越之族屡见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据《越尉佗列传》,尉佗、屠睢所攻之百越,略当今广东、广西之地。越、楚分界亦可于《货殖列传》中推寻:“衡山、九江、豫章、长沙,为南楚。”蒙文通说:“传谓豫章、长沙(略当今江西、湖南)为南楚,当是楚之南土;而越则更在其南,《方言》所谓‘南楚之南’者也。”^⑤再证以《淮南子》和《汉书》。《淮南子·人间》言秦始皇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等特产,发率五十万为五军,驻守谭城、九

① 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7~558 页。

② 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第 559 页。

③ 胡昭曦:《蒙文通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载《蒙文通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 2005 年版,第 63、64 页。

④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312 页。

⑤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 301 页。

疑、番禺、南野、馀干，以与越人战。五军所处为一勾月弧，长沙、豫章正处此勾月弧内。《汉书·地理志》载：“粤（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此七郡含会稽正处此勾月弧之外。蒙文通分析说：“《货殖列传》以习俗判楚地，《地理志》以分野述越地，而《淮南子》则以五军所处划楚、越之界；三书虽各明一事，然其所说楚、越之地则若合符节。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下游几尽楚地，何得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①针对陶维英书所谓“春秋战国时代以前”“越族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他进一步据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春秋之初，楚武王始开濮地，楚文王尽食江汉诸姬。楚成王时，‘楚地千里’，楚庄王时，北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问鼎于周室，继又大败晋师于郟。是在越人兴盛之前，楚人早已据有长江中下游之地，越人曾不得侧足其间。”陶维英书所言，“诚警说也”^②。

蒙文通将其擅长考证、精熟史料的治学特色，与运用唯物史观洞察历史问题之本质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全面的观点、辩证分析的观点、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特别是，由于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蒙文通更加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敏锐地看出关于古代越族问题的言论背后蕴涵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现存的史料有的记载首尾不备，有的因长期传抄而致误，“苟不精研深思，旁通曲证，诋证其文字，考镜其源流，匪特难免郢书燕说、鱼鲁亥豕之失，且将俾居心叵测之徒捏造事实、歪曲历史之机”^③。拿出辨析精确的史实，驳倒蓄意散布之谬见，乃是攸关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崇高利益的大事情！李一氓先生高度评价蒙文通教授这部著作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作者引据丰富详审的史料，对陶著所作的辩驳有凭有据，令人信服，并对古籍记载有歧误之处深入分析，从而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性。他说：“作者作为历史学家，自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从中国民族而言，这就不单纯涉及到一个越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民族的整体问题。因此，作者这本书自然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着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

的责任感。”^④

以上是以蒙文通为个案，简要分析他在建国后因接受唯物史观为指导，拓展了“贯通性研究”的新视野，从而在中国封建经济与社会结构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卓著成就。而从新历史考证学者群体来说，此非特例，而是具有共性的特点。如谭其骧原先撰有《秦郡新考》等，以考辨精审、论据坚实而大受称道。1949年以后，由于他自觉地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大大开阔了视野，发扬原先精于考证的长处的同时，透过历史表象探求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如《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1960）、《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1962）、《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1965）、《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2）、《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1981）、《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1986）、《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1986）、《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1988）等，这些研究成果与建国前相比，无论从考察历史问题的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说，还是从论题所包含的思想性深度说，尤其是从总结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的高度和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说，毫无疑问都达到了更高的学术境界。唐长孺早年研究辽金元史，不久即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46年，他撰成《唐书兵志笺证》一稿尤为精于考证。1949年以后，唐长孺治学仍以扎实深入著称，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与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先生一同开拓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经过唐长孺这批学者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在魏晋南北朝的多个领域取得全面创获。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

①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2页。

②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2页。

③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59页。

④ 李一氓：《读〈越史丛考〉》，《读书》1984年第4期。

进展”^①。唐长孺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1955)和《南朝寒人的兴起》(1959),即为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互动的角度来揭示魏晋南北朝社会特征及其演进脉络的成功之作。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重视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探索,因而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出现了古史分期讨论的热潮,有不少原先属于新考证学派的学者也积极参加,并且撰写了很有影响的论著。这里以赵光贤先生为例,他所著《周代社会辨析》从 1958 年属稿到 1980 年出版,经历了整整 22 年。这部著作出版后,即以其鲜明的理论指导、详审的史料和深入精到的辨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在古史分期讨论中属于“西周封建论”者,书中对于周代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的条件及其主要特征、主要农业生产者的身份问题、“宗法制度”与封建制社会的关系问题等,所作的考辨、分析,尤具卓识。此书确实表明作者将研究工作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包括十分重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使用,并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为指导,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作贯通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因而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评论者誉之为“辨有特色,析有新意”的成功之作^②。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三位学者各自在历史地理学、魏晋南北朝史、先秦史领域的建树,同样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何使新历史考证学绽放出新的光彩。因笔者在相关论著中已作过讨论^③,这里就不再详述。

四、新历史考证学学术路向的宝贵启示

审视、总结新历史考证学发展道路的根本经验,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和指导作用对于推进学术研究达到新境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即使是以重视扩大史料范围和严密考证辨析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考证学也同样如此。20 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究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大体以 20 世纪初为界,此前的清代考证学是传统学术,此后才属于近代学术。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虽然得益于“四大新史料”的发现,但更为重要的推动作

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由于“新史学”的倡导,学者们逐步确立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并以更开阔的眼界进行学术探索,研究视野由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史料选取范围由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扩大到“上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目标,历史考证学领域也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再加上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拓展,西方传入的新学理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如西方学者所重视的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则易被接受和传播,产生了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总之,由于治史观念、学术视野、治史方法跃进到更高的层次,促使新历史考证学者竞相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力求探索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古代历史作出新解;其著述形式也不再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排比和个别史实的考订,而是冀图达到概念的层次性和知识的体系性;许多学者还能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认识到治史必须与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阐发历代志士仁人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以往学者所擅长的严密考证方法,至此与更加进步的科学认识和贯通研究相结合,促使新历史考证学者们焕发出新的创造活力,相继取得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谱写出 20 世纪学术史上气势非凡的新篇章。

其次,客观地评价 1949 年以后由于唯物史观的指导,新历史考证学不断推进并达到新境界,对于正确认识现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唯物史观的指导能使新历史考证学绽放出新的灿烂之花呢?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

① 曹文柱等:《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② 参见张作耀《辨有特色,析有新意》,《历史研究》1981 年第 6 期;王玉哲《一部新的古史分期问题的专著——读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历史教学》1982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陈其泰主编《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第七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陈其泰《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方法论,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确有许多相通之处。譬如,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充分地占用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注重对史料的出处甄别、审查,务求立论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同样要求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求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以上诸项,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但同时,唯物史观又远远高出实证史学,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一系列根本原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把历史看作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对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以至思想文化等项因素作综合考察;探求推动历史演进的诸因素如何构成合力;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将其置于一定历史条件范围内来作考察和评价等。这样认识的广度和洞察历史现象本质的识见,是传统思想和近代进化史观等所无法比拟的。唯物史观又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与时俱进,并且能与每一国家民族复杂多样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作出恰当的概括。像唯物史观理论这样的科学体系,研究者如能潜心钻研,真正地掌握它,用以指导对错综变化的历史现象的分析,学术工作就能进入新境。有的学者称许唐长孺建国后治学“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①。此等成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结合的结果。周一良先生称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是港台与欧美中国史学著作中“最有价值者”。他评论说:“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所不足者,只就制度论制度,未能放眼当时政治、社会、事件、人物,以探求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这种地方大陆学人就显出所长了。”^②周一良以行家评论,发人深思。大陆学人之所以能联系政治、社会等项论述“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正因为有宏观理论对实证研究作指导,所以能够达到对历史的整体性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136 天津社会科学 2014年第5期

新历史考证学在1949年以后取得的新成果,构成了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演进经历了严重曲折,发生过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我们应认真吸取其教训。我们今天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与教条主义严格划清界限的。“十七年”史学尽管有过严重失误,但从总体而言,成绩仍是巨大的。将“十七年”史学贬责为“完全政治化”,“只剩下一部农民战争史”,这种看法与事实极不相符。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也是考察、评价“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论问题。不应只看到教条化、公式化在一段时间内的盛行和危害,更不能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至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总结新历史考证学由于自觉地坚持“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二者相结合而取得的两次巨大飞跃,使我们对于21世纪史学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中国是一个重视学史、治史、修史的国度,又是一个历史内涵宏富、史料依据丰繁的国度,发展新世纪史学,必须发扬中国史学包括传统史学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自身优势,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同时坚决摒弃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恶劣学风,必须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和激发创新精神,自觉地将以上数项结合起来,扎实努力,就一定能不断开创中国史学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① 朱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前言,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